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二)

# 日本学者 视野中的 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AS4/1

DG24/10

日本学者

# 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内部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

RIBEN XUEZHE SHIYIEZHONGDE

MAOZEDONG SIXIANG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32开 7.75印张 170,300字 000,001—20,000册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73-0020-X/C·2 内部发行 定价 2.50 元

##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并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86年10月

## 目 录

|                                   |             |
|-----------------------------------|-------------|
| 毛泽东早期思想及其特征·····                  | 中嶋岭雄 ( 1 )  |
| 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                   | 永野英身 ( 14 ) |
|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新岛淳良 ( 32 ) |
|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 野村浩一 ( 59 ) |
|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节译)·····              | 宇野重昭 ( 73 ) |
| 延安时代和毛泽东路线的确立 (节译)·····           | 德田教之 ( 86 ) |
|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 柳田谦十郎 (106) |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br>——其继承与发展····· | 新岛淳良 (121)  |
|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 中西功 (144)   |
| 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概况及评述·····            | 丁 一 (155)   |
| 附录一 欧美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情况概述·····          | 李君如 (173)   |
| 附录二 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 ·····             | S·施拉姆 (192) |

# 毛泽东早期思想及其特征

中嶋岭雄

编者按：日本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政治评论家中嶋岭雄，在其所著的《现代中国论》（1980年，青木书店出版）一书中，对毛泽东早期思想作了一些探讨。现将该书的有关章节摘译如下，以供参考。

作者在概述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时指出，青年毛泽东曾与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会产生过一时的共鸣，后来又倾倒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胡适和陈独秀，接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同情无政府主义，尔后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不久，毛泽东又在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作者还分析了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三个特征：一、政治实践促使毛泽东的思想急剧转变；二、土地革命思想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支柱；三、英雄豪杰的权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

## 一、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出生的1893年，正是处在急剧崩溃过程中的清朝末

期，也是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只要列举这一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如日本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俄、德、法“三国干涉”之后各国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义和团事件；日俄战争；孙文等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曲折前进等等，便可以大体了解毛泽东幼少年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毛泽东是在受到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具有革命传统的湖南农村长大的。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与晚年毛泽东那种乖僻性格相仿的幼少年时期的特征。毛泽东曾几次变换学校或离家出走，当时他对正统的学问——经书不感兴趣，而对《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传奇小说即英雄故事却十分入迷。而且，这些英雄故事使他醉心于尧、舜、秦始皇、刘邦及汉武帝等中国古代勇敢的帝王。这些书确实吸引了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后来他在同埃德加·斯诺谈及生平时也讲道：“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sup>①</sup>因此，我认为这些书对他的思想形成和革命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不久之后，毛泽东接触了主张以君主立宪制代替清朝专制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从而了解了中国的历史现状。同时，在毛泽东的周围也相继发生了促进觉醒的事件。他目睹了湖南各地连续发生的农民暴动和对此进行的残酷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毛泽东已成为一名少年时期特有的“烦恼的理想主义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才18岁。这一年，他进了湖南省会长沙的省立中学读书。一般说来，他进入青年时期的第一步从此开始了。在长沙，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孙文领导的革命同盟会的报纸《民报》，他深为感动。深受1905年俄国革命

影响的革命同盟会已经在机关杂志《民报》上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还分辨不清革命同盟会与改良派的区别,于是,在辛亥革命之际,与学友一起参加了革命军(“新军”)。当清朝统治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毛泽东退出了中学,开始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此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同时读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开始接触近代欧洲的各种思潮。

不久,毛泽东又恢复了学生生活,1913至1918年他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这个时期,辛亥革命的各种成果完全落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遇到了挫折。面对着这种现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举起西欧的民主主义旗帜,谋求彻底批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特别是要彻底批判儒教的伦理,它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就在这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冲击和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共鸣,很快化为具体的行动。1918年春,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以李大钊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两篇论文《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论文赞扬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同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明确表明其任务是介绍十月革命。当时,与师范学校教师杨昌济的理想主义教育产生共鸣的毛泽东,自然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不久,他组织了以湖南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团体“新民学会”。毛泽东的组织才能从这时起便显露了出来。

然而，当时毛泽东的思想立场，正如后来他自己回忆的那样，“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当毛泽东结束学生生活时，“新民学会”派遣留学生去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未参加留学，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去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北大期间，尽管李大钊是大学图书馆主任，但毛泽东与李大钊没有更深的接触，半年后便结束了北京的生活，重新回到长沙。此时，与其说他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共鸣的青年。当时正值1919年，这一年，中国出现了新的革命胎动，作为现实的政治行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以高涨的五四运动为背景，成为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的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并担任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不久，湖南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反对湖南军阀统治的湖南自治运动。为了深入进行这一斗争，毛泽东于1920年代表“新民学会”再度进京。这时，毛泽东第一次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中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样，1920年，对于27岁的毛泽东来说，是思想转变的一年。毛泽东自己也曾讲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中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毛泽东已经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有十二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的方针是，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开展组织活动。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工人运动。此后，作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的政治生活便迅速展开，这是毛泽东第

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文献之后仅一年的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三年即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了。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1925 年“五卅”事件爆发,全国响起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呼声。继“五卅”事件之后的政治高潮渗透到了湖南农村,这时,毛泽东迈开了农村工作的第一步,他的活动领域由工人运动转到了农民运动。自那时起,毛泽东的政治生活场所经常在农村,而且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献身于农民运动之中。1926 年,以北伐为目标,国共合作取得了进展,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和国民党政治部机关杂志《政治周报》的编辑,并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一时期,毛泽东以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为基础发表了两篇论文。作为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处女作的第一篇论文《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分析了当时受军阀赵恒惕统治的湖南农村的阶级关系。他的第二篇论文即收录在《毛泽东选集》开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展了第一篇论文的观点。这后一篇论文在开头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论断指出了中国农民所处的阶级地位,强调了需要进行激进的土地革命。然而,当时采取工人运动重点主义立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拒绝将这篇论文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批判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毛泽东在 1927 年初又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最后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政治生活初期所发表的论文主题都是以农民运动和农村的阶级分析为中心的。在这些

论文中所表示的对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要求和对农民运动的极大期待，一直贯穿在他后来的《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兴国调查》（1931年，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等论文之中，并使他的土地革命思想变成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让无产阶级，而是让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中农层参加革命实践，这才是最优先的政治课题。当然，毛泽东坚持土地革命的思想是他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的最大理由，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实际上，直到长征途中的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的路线为止，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对采取工人运动中心主义或城市中心主义路线的党内主流派的不满，那同时也是对作为党内主流派背景的共产国际的叛逆；在实践上，他通过农村根据地方式使自己的方针与党中央并行。同时，在他早期的诸篇论文中，全然看不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对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进行介绍。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不是摄取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总结和对兴国县的调查、长冈乡的调查、才溪乡的调查等许多农村的实地调查，在信念上形成了以土地革命思想为基础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革命的革命观。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不久便与他的以游击战术（从根据地革命方式引出来的战术）为中心的军事思想一起，成为支撑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基本支柱。

## 二、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征

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第一步，是从醉心于中国古

代的英雄及传奇小说的主人公的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成长为赞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理想主义者开始的。青年时期，他曾与孙文等人的革命同盟会产生过一时的共鸣，后来又倾倒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胡适和陈独秀。接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同情无政府主义，尔后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且，以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为转机，毛泽东的实践活动迅速开始，不久在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的这种变化多端的思想经历，的确是当时中国的“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典型。然而，在上述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包含着许多探讨“毛泽东思想”时不可忽略的问题。这里，想就这些问题，即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征进行一下研究。

### 第一，政治实践促使毛泽东的思想急剧转变

毛泽东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文献，并以此为转机自觉完成自己的思想转变是在1920年，即在他27岁的时候。当考虑到此时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时，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于迟了。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在对国民革命的展望问题上，与其说是与孙文，不如说是与改良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张产生共鸣；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新青年》周围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不是李大钊和鲁迅的赞美者，而是胡适和陈独秀的赞美者。尽管有这样的过程，但是毛泽东自认为以1920年为转机自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在1921年作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是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若干入门著作之后仅仅一年的事情。这种急剧的转变情况，有力地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何等迫切的课题。这里，还有一

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指出，即在毛泽东自认为思想转变以前的变化多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于吸收到自己思想胚胎内的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各种思潮和人物形象，当时的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以至如何辨别的？关于这一点，假如考虑到当时的那种将实践活动放在最优先地位的中国历史环境和毛泽东本人一贯具有的乐天派的性格，就不会认为他是在极短的期间内，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进行独立的思考，经过自我否定的媒介，在思想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被毛泽东接受之日起，就具备了容易变样的条件，这是由于他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吸收有各种倾向的缘故。后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而显然存在的他的思想的各个侧面，也应该在这样的脉络中进行观察。

如果进一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就会发现，尽管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冲动性的共鸣，但就思想上和理论体系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言，就连那时站在最先进立场上的李大钊也是极不完全和极为朴素的。当时，在仅仅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毛泽东身上，更难找到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说，面临当时的中国现状，特别是在以湖南为中心的高涨的农民运动中，改变农民的奴隶状态，即打倒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是迫在眉睫的课题；“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热情的信念和行动，十分必要；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事实。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只能以暴动形式存在，自己的政治实践才是获取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保证。似乎可以说，这种立场并不是由于接受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结果，

而是一方面由于受俄国革命——那是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俄国的社会形态和思想环境中、在激烈动荡的帝国主义时代取得胜利的伟大特例——的影响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所限制，另一方面为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所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上述过程的结果，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与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相差悬殊。青年马克思在彻底批判德国的现状并立志革命时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sup>②</sup>他要求人们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号召参加革命的实践。

当时的中国现实，要求政治实践作为至上命令，没有给毛泽东系统地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充裕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可以确信的行动指针和战略战术的纲领予以接受的，而且在他后来的理论形成过程中，又继承了这种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同时也基本上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性格。

## 第二，土地革命思想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支柱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是依靠毛泽东的独创性取得的。所谓独创性，是指在土地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将农民聚集到革命的队伍中，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并且使获得的根据地和周围农村迅速革命化。可以说，这里所指的农村根据地革命方式的各种经验，即激进的土地改革，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术，工农红军的日常规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至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行动方式的源泉，它已成为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性格的原型要素。

如前所述，以土地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战

略，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形成的。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创见之所以可行，是由于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农民要求改变极其悲惨状况的愿望。他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思想，不久形成了他的以农民、特别是以贫农和工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的理论，这种理论独立于列宁的工农专政理论之外。众所周知，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著名的口号所表明的工农专政理论。列宁指出：“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明确地规定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这种农民斗争的任务。然而，那时列宁也指出：“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扫清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地和坚决地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他没有忘记指出农民作用的局限性。

与此相反，毛泽东以“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种认识为基本出发点，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可以说，毛泽东最初就看到了农民更富有革命的战斗性，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因而，与列宁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工农专政的

理论相反，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始终以农民为主体。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当时的中国现状从这个考察对象中除去。当时的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成熟，几乎还不能说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成分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分量。如果从革命理论的体系上看，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自然是处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延长线上。然而，在1935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找不到从列宁那里摄取理论的痕迹，毛泽东理论中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思想的特殊性，正与此有关。应该肯定这样一个前提：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并非由于继承了列宁的理论，而是根据在农民运动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土地革命思想形成的。

既然毛泽东的上述创见是依据农民运动的经验而产生的，是否可以单纯地认为那是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结果呢？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特点。

一般说来，在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中，虽然农民为与西欧式个人主义意识不同的关闭式的、自立的小天地所局限，但是以这种关门主义为前提的共同体性质的乡土意识却依然传统地保持着。以这种乡土意识为媒介构成的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均质社会，那是培育特殊的中国的乌托邦平等思想的母体。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多次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所表现的激进主义，决不是与这种平等思想无缘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井田制”、“均田法”等土地制度，不用说，还有表现太平天国理想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思想中的“去产界公生业”的建议，作为孙文民主主义支柱的“平均地权”以及新三民主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的提出等等，可以说这些改革农村的志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特点。

当我们研究生长在农村的毛泽东在不久前的农民运动中形成的土地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时，不能忘记上述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因为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所以不能认为其形成过程与中国的传统意识无关。毛泽东的创见之所以有效，可以说是由于他巧妙地激发了潜在于中国农民中的传统意识的结果。

当然，上述土地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和背景，使“毛泽东思想”孕育着极为浓厚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思想要素。

### 第三，英雄豪杰的权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

乍一看，这一点也许不能作为考察的对象，然而，当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并联想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曾认为幼少年时期百读不厌的那些英雄列传对他自己影响很大时，我们不难看出那种影响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而且，在谈论“毛泽东思想”时，正因为他的军事思想的侧面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支柱，所以对此切不可忽视。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再三引用中国古代虚构的和实际存在的英雄豪杰展开武打的场面，譬如在集中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将《水浒传》的主人公林冲的武勇作为“战略退却”之例加以引用。而且，这样的事实，不单纯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作个比喻，而是正如他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那样，加进了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使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醉的英雄豪杰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抱有“正义必胜”信念时的鲜明映象，而且这些英雄豪杰的权术，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源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是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